

◀ (上接 12 版)

“热烈欢迎”，实际上却常常受到质疑，甚至被惯于调侃东方主义的恶趣味所讽刺讥诮，即便这些还算不上彻头彻尾的敌意。比如，发表于1910年《校友季刊》“伊利诺伊大学中国留学生”专栏的一份报告竟然这样写道：

早些时候，还从未听说过有人想过招收中国学生。在那个年代，中国完全是个恐怖的代名词，其国民是“野人蛮族”，其前景黯如地狱。想象一下我校的某位先驱……在和中国人见面时……尽管对方也能履行真正的美式礼仪，发自内心而又热情适度，但中国学生的手实在是又小又细，手指修长，一触生凉，甚至可以说是一击即碎……这种握手可不像罗斯福与塔夫脱那样。（“Chinese Students at Illinois” *The Alumni Quarterly* 1 no.4, October 1910: 363.）

另外陈六馆（土木工程学硕士，1924）的遭遇也很能说明问题。他以二战时期担任重庆附近一座大型机场建设的总工程师而闻名于世，而这座用于供美军“空中堡垒”巨型轰炸机起降的机场，完全是在缺乏现代科技含量的情况下，由征募而来的数万名农民一手一脚所建造。就连1941年曾到访重庆的美国文豪海明威在目睹了建设现场之后，都盛赞这样一项伟大工程的总设计师无愧于中国英雄主义代言人的称号。但就是这位杰出人物，学生时代每次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中心就餐时，都会遭到白人学生的冷遇。事实上，即便迟至1945年，厄巴那一香槟地区依然有超过92%的房东不愿意把房子出租给外国留学生。（Huang, “The Soft Power of U.S. Students and Foundation of a Chinese America Intellectual Community in Urbana - Champaign,” pp.190 -91 and 303 -305; Ernest Hemingway, *By -Line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Articles and Dispatches of Four Decades*, New York, Scribner, 1998）

不过，重重困难并未阻挡留学的脚步，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中国留学生已经成为伊利诺伊大学人数最多的留学生群体，其余则多来自日本、巴西、菲律宾和印度。随着在校大学生日益国际化，为了帮助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更好地适应美国的学术环境，詹姆斯校长于1913年建立了“外国学生办事处”（1919年升格为“外国留学生院”），这也被视做他为伊利诺伊大学留下的



↑ 1910年，第二批庚款留学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合影，一排左二为竺可桢。



↑ 1922年出席在美国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商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合影，左一为穆藕初，其时距他从美国学成归国已有八年。八年中他一面经营纱厂，一面不遗余力推介最新的管理思想和植棉技术。



↑ 1980年，李安（右一）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

→ 1941年，严东生在燕京大学。

均为资料图片



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他坚持安排一位对外国文化有过亲身体验的教职人员（而非行政人员）来担任办事处的主管。一位以外语教学法知名的拉丁语教授詹姆斯·西摩成为首席人选。为了彰显这个位置的重要性，詹姆斯校长甚至还给西摩教授增加了300美元的薪酬（后来增幅提高到700美元）。作为一名本身就博学敬业的学者，再加上詹姆斯校长的大力支持，西摩教授放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比如开设语言扩展课程，提供一对一的语言教学服务，以及建立遍布全城的寄宿家庭制度。另外，他还花费了大量时间与各国留学生交流他们在适应美

国生活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从而使“外国学生办事处”（几乎等同于“中国学生俱乐部”）成为一个让中国留学生倍感亲切的温馨家园。该办事处的成功也促使美国其他高校在接下来的几年内陆续建立了类似机构，以便为广大留学生提供建议和帮助。而西摩本人则在1921年接受了中国毕业生的邀请，用两年时间赴华游历，并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组织了类似的英语培训课程。

二

埃德蒙·詹姆斯校长通过

这些创新举措来招收和培养中国学生，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同时伊利诺伊大学也在1910到1920年代成为那些渴望探索西方文化精神的中国学生的留学圣地。而继任者大卫·金利（David Kinley 1920—1930在任）此前曾经担任过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生院院长和副校长，对学校一直以来发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工作重点了如指掌，因此也在最大程度上沿袭了前任校长的开创性政策。虽然他本身并未获得新的建树，但他始终密切关注中国毕业生在国内的职业发展状况，并成为首位访华的美国大学校长。1930年，金利卸任后随即展开亚洲之行，涉足若干个中国城市，并在返美后向新任校长哈里·蔡斯（Harry Chase, 1930—1933在任）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介绍他对刚刚访问过的几所中国顶尖学府的考察心得以及对中国教育发展现状的由衷看法。尽管伊利诺伊大学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密切联系，但这份材料直到今天仍是校方领导所撰写的关于中国的唯一一份官方报告。如果说埃德蒙·詹姆斯以一种颇具传教士精神的理想主义，寄希望于美国能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大卫·金利则在其报告中呈现出有所保留的乐观态度。当时的中国既饱受西方列强的操控，又被日本不断在满洲增兵所侵扰，广大知识分子身上普遍存在着强烈的反帝倾向和民族情绪，而金利对中美关系的清醒认识就植根于访华期间的这些亲身体验。

此次访问应该是由一些素有威望的中国校友安排打理的。实际上，从1910年代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内一直活跃着一个名为“伊利诺伊大学校友会”的民间组织，并在诸多核心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以及重庆（抗日战争期间）等设有分部。不少校友会成员都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中美关系增进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王景春（1882—1956）便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1909年他受伍廷芳选荐来到伊利诺伊大学求学并获得铁路工程学硕士学位，两年后又在大卫·金利的指导下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留学生在美国很难得到助学金和实习机会，时任校长的詹姆斯和导师金利都曾动用私人关系帮他筹措，包括在学校讲授一门《东方文化》的课程，以及在芝加哥火车站进行一次实习。而王景春学成归国的年代，中国的铁路系统不仅规模小，并且由于长期被西方诸列强和日本侵略者

所分别管控，难免显得七零八落、各自为营。为了国家的整体发展与经济现代化，王景春誓要夺回中国铁路主权，并对整个铁路交通系统进行重组和翻修。正直的人格品性和深厚的专业学养为他赢得了“中国施政三杰之一”的美誉。他与导师金利多年保持联系，在全力推动中美文化交流方面与其师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设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中国教育代表团承担着管理全部在美中国留学生的重任，而他在数年间都担任该组织的负责人。（Carol Huang, 《王景春，中国第一位铁路管理博士》，《中国时报》“文学专栏” 5 December 2001:1; Stacey Bieler, “Wang Jingchun,” i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校友则是被称为中国“棉纱大王”的穆藕初（1876—1943）。他生于上海一个从事棉花业的小商人家庭，1909年赴美留学时已年届33岁，五年后收获伊利诺伊大学农学学士学位，此后又在德克萨斯州农工学院取得棉花科硕士学位。怀揣建立现代纺织工业的梦想，他甫一回国便尝试开设了三家棉纺厂，将此前在美国学到的关于棉籽和棉纺业科学管理的知识投入实际应用，而这两者都需要进行大量的本土化实践，为此他和其他棉花种植与生产方面的同行分享自己的经验成果。另外，他还发起建立了位于上海的华商纱布交易所和中华劝工银行，以加强棉纺织市场的规范性与稳定性。可惜，他的棉纺事业因1930年代日本的加速入侵而备受打击。纵观其整个职业生涯，穆藕初都算得上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忠实校友，不仅一直和大卫·金利保持联系，还自毕业之初就加入了校友会，并慷慨解囊予以资助。同时，他也致力于推动校友会在中国的发展，多年担任留美归国学生联合会主席。（Moh Hsing Yueh, *Alumni Biographical File, 1913–1936*, RS 2614,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rchiv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ampaign–Urbana, IL; Mu Jiaxiu et al. (eds.), 《穆藕初先生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以王景春和穆藕初为代表的伊利诺伊大学校友会成员，在大卫·金利访华期间给予了热情招待。二人不仅为其举办了数场盛大的宴会，更全程陪伴，贯穿始终。或许是通过近距离的交流，大卫·金利才惊讶地发现，归国留学生们如果不能

(下转 14 版) ➡